目　录

抗战时期地下党在湖北省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的活动
……县党史办（1）
忆大革命时期松滋儿童团的革命活动……胡　拓（26）
我在衡河市起义投诚的前前后后……周上凡（32）
恒升裕商号的变迁与发展……熊子凌（39）
松滋县解放的回忆……钱兆增（49）
“绝妙银钩铁划书”——
回忆父亲王铁公……王绍家（52）
我在武汉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回忆…胡　拓（58）
关于周上凡投诚的片断……刘明哲（62）
回忆雷鸣泽二三事……周上凡（64）
李人林部队在松滋的筹款活动……财税志办（67）
老城公演《雷雨》的始末……董元伯（73）
民国时期松滋县银行发行本票流通市面的前前后后
……金融志办（76）
松滋青年抗战服务社的建立及活动情况……董元伯（79）
老城“药王会”……卫生志办（82）
解放前的松滋宗教……周经然搜集整理（85）
松滋最早的二辆汽车……交通志办（97）
松滋育婴堂考……周经然（104）
组建初期的松滋京剧团……杨至仁、靳开演（109）
附：征集文史资料参考题……（11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抗战时期地下党在湖北省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的活动

县党史办

湖北省第四区(荆州)简易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简师)，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湖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下简称荆州专员公署）创办，实际由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以下简称地下党）领导的一所在国民教育掩护下的“抗大式”学校。

简师地下党组织，从1938年8月建立地下党支部，至1941年4月全部撤退、转移，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正确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执行南方局、湘鄂西区党委及后来的湘鄂边特委的指示，在创建和扩大抗日活动据点、建立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加强青年学生的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与校内外国民党顽固派斗争、输送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湘鄂边抗日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产生了重要影响，曾被誉为“江南的抗大”、“湖北的陕公”（陕北公学）。尤其是简师地下党培养出来的大批抗日骨干，在激烈、复杂、艰苦、残酷的抗日战争及其后的解放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幸存

者中的大多数，在尔后的革命中继续锻炼成长，担负了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为谋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伟事业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抗日活动据点的创建与扩大

（一）简师的建立

1937年2月，第四区专员公署名曰培养小学师资，实则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乃在荆州城大十字街“鸿益典当铺”开办了“湖北省第四区简易师范学校”，由荆州专员公署专员徐承熙兼任校长，国民党员、复兴社分子王家福充任教导处主任并代行校长职权。学生在本区所属各县招收，经费由各县按在校人数摊派。简师设有师范班、师范科共两个班（师范班由小学毕业生报考，学制四年；师范科由初中毕业生报考，学制一年），约一百人。

1937年秋，简师迁至原荆州高级农业学校校址。1938年元月，第一届师范科毕业后，经荆州专员公署同意，招收女生四十多人。

（二）抗日活动据点的创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1938年春，在中共荆沙特支（同年六月改为鄂西中心县委）领导下，荆州、沙市地区的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兴起。虽然此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但蒋介石并未放弃卖国内战政策，继续压制人民的抗日运动。5月，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下令解散了“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

救”（青年救国团）等抗日救亡团体。简师在王家福严密控制下，也不准唱抗战歌曲，不准阅读进步书刊，不准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不准男女学生进出一个大门，并克扣伙食费，对学生进行虐待。王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爱国进步学生的无比愤慨。于是，在6月1日爆发了震动荆沙、波及武汉的驱逐王家福的“6．1”学潮。

6月1日中午，简师学生乘王家福外出之机，将揭露王罪行的标语、口号贴满了校内墙壁。晚上，待王家福刚进校门，愤怒的学生便以灭灯为号，冲进王的宿舍。王家福见势不好，越墙狼狈逃遁。事发后，由进步学生李良珂连夜起草了一份呈文，递交荆州专员公署，以防国民党荆沙警备司令部借口镇压。李还起草了一份“6·1”宣言，分送荆沙地区各阶层、各机关团体及报社，以求声援。

简师的“6·1”学潮，推动了荆沙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荆沙地区各界群众的抗日活动有力地支持了简师的“驱王运动”。6月3日，新任荆州专员公署专员兼简师校长郗汉元派专员公署科员田绥祥等三人调查处理此次事件。田在调查处理过程中，站在爱国青年、进步学生一边，疏通郗汉元，同意了广大学生提出的正义要求，“6·1”学潮取得了胜利。同时，田绥祥说服简师学生，让王家福暂时留校，又使王得以体面下台。7月，荆州专员公署任命田绥祥为简师教导处主任并代行校长职权。

田绥祥，又名田奋民，河北省安新县人，在河北省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过著名的“二师风潮”，后来参加过广州起义；1924年由辛璞田介绍加入共产党，1925年，又由辛介绍加入国民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田绥祥失掉了与共

产党的关系。1938年2月，田绥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由周介绍给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范必武。董指示田，要利用老国民党员身份，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陈果夫（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部长）、张厉生（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邵汉元（国民党徐州专员公署专员）的旧关系，获得社会职业，取得合法地位，进行党的地下工作。董还告知田，邵汉元将有新任。未几，邵汉元发表为湖北省第四区专员公署专员后，即邀田绥祥同往荆州，始任荆州专署科员。

“6·1”学潮后，董必武对简师极为重视，决定加强对简师的领导和工作，把简师逐步建成抗日活动的据点。陈诚却对简师的抗日学潮极端仇视，欲拔除而后快。6月初，日寇实行其进攻郑州，南取武汉、广州的作战计划。7月，省政府撤退前在武昌珞珈山召开了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田绥祥代表第四区专员公署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决定宜昌以下的中学一律停办，均合并到恩施地区的联合中学，陈诚借撤退之机，命令将四区简师并入利川乡师。会议期间，田绥祥为简师裁并的事到八路军办事处请示董必武。为了贯彻党中央独立自主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组织发动农民，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知识，准备建立抗日游击武装，董必武指示田绥祥，“简师不能停办，要转移到农村，还要逐步扩大，把简师办成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湘鄂西抗日活动的据点”。由于董必武的坚决支持，广大学生的强烈抵制，田绥祥的据理力争，多方斡旋，迫使省政府收回成命，同意将简师迁往农村，继续开办。

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中央党部从武汉撤至重庆，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省政府迁往恩施。荆州、沙市也沦陷在即。田绥祥根据董必武及中共湖北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将简师迁至地处江南和湘鄂边界而又具有革命传统的松滋县。10月中旬，田绥祥偕师范班学生邹应国赴松滋县踏勘校址，经与松滋县县长鄢说商定，简师迁入松滋县西斋镇灵鹫寺。

西斋镇灵鹫寺，是一座寺庙。10月25日，随校迁灵鹫寺的有女子师范科学生二十余人，师范班学生三十余人，随迁的还有教员张国栋（又名张金华，湖北省宜昌人，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共产党员，1940年在恩施被国民党杀害）、傅君哲（女，北京人，北京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延安抗大毕业）、刘秉性（北京人，共产党员）、校工彭友山。此时，郡汉元仍兼校长，田绥祥仍为教导处主任并代行校长职权。至此，简师已成为地下党领导的湘鄂西地区抗日活动的据点。

（三）抗日活动据点的扩大

1938年冬，松（滋）枝（江）宜（都）三县动员委员会办事处主任、松滋籍爱国知名人士雷鸣泽，效法应城汤池训练班，在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的支持下，在松滋县庆贺寺举办了松枝宜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次年6月，训练班第一期二百多名学员结业后，正筹组招收第二期学员时，湖北省政府、荆州专员公署、松滋县政府以有“异党”活动为借口，取消了松枝宜三县动员委员会，解除了雷鸣泽的职务，撤销了松枝宜战时工作人员训练班。

1939年夏，简师女子师范科学生毕业，仅剩师范班学生三十多人。灵鹫寺左侧是西斋小学，该校校长政治上反动，经常煽动学生制造事端；简师右侧，是国民党区公所，也不时寻衅滋事。同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对简师的“抗日救亡”

活动，早就不满意。事实上，对松枝宜战训班的镇压，也是对简师的恫吓。所以，当时简师的处境困难、险恶。

为保存简师据点，巩固和扩大培养抗日干部阵地，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于同年8月指示田绥祥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以灵鹫寺校址小，荆州地区流亡在松滋的失学青年多等为理由，要求荆州专员公署专员兼简师校长金巨堂（郡汉元病逝后新接任）批准简师“增加师范班班次、增设附中部、迁校庆贺寺”的办学计划。

为改变简师的处境，田绥祥以报告郡汉元病逝消息为由，分别给陈果夫、张厉生去函。函中提出了希望关照时子舟（湖北省教育厅长）、金巨堂批准简师扩校迁址的报告。不久，陈果夫、张厉生均在回信中说明时子舟、金巨堂已同意其办学计划。

金巨堂接任荆州专员公署专员后，荆沙警备司令部司令喻建章多次向金呈报简师有共产党的活动，要金签发解散简师、逮捕张国栋、傅君哲、滕久炎、赵茜、吴梅庵的密令。田绥祥带着张厉生、陈果夫的信见到金巨堂，并向金汇报简师的扩校计划后，虽然张、陈关照过金，但金仍指责简师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田绥祥对金的指控，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了反驳。金与田的交谈中，得知田绥祥的祖父曾是自己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的老师时，便提出了交换条件：田绥祥辞去张国栋、傅君哲等五人，金巨堂批准简师的办学计划。田绥祥为保护和扩大抗日活动据点，不与国民党争一时一事之短长，张、傅等人经湘鄂西区党委调往宜昌等处后，金巨堂批准了简师“增加师范班班次，增设附中部，迁址庆贺寺”的报告。同年9月，简师由灵鹫寺迁入庆贺寺。

庆贺寺，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刹禅寺，位于山高林密的群山环抱之中，东北距刘家场约三公里，西南与湖南省石门、澧县、桑植毗邻，其地势险要，难攻易守，曾为贺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装割据的范围，较适宜于建立抗日根据地。

简师迁入庆贺寺后，进入了鼎盛时期。是年秋，除原有的师范科、师范班外，新招第三届师范科四十多人、附中部初一（上）五十多人、初一（下）三十多人、初二（上）二十多人，全校学生二百余人。1940年春，招收初一（上）甲、乙班插班生若干人，全校学生三百余人。1940年秋，第四届师范科学生毕业后，招收第二届师范班四十余人、初一（上）一个班，至此，全校学生三百八十余人。

简师规模扩大后，南方局、湘鄂西区党委通过田绥祥安排了许多地下党员任教，以其职业潜伏下来，从事简师抗日活动据点的工作。其中，史林峰（林峰）担任了训育课长、江涛担任了教育课长、刘秉性担任了事务课长。简师抗日活动据点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二、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一）地下党组织的建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汉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湖北的工农运动获得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十年内战，湖北的党组织几乎被破坏殆尽。

1938年元月，由临时省委正式成立了以郭述申、陶铸、钱瑛、何功伟（何彬）等同志组成的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委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为改变党的组织与党的

政治影响及其历史责任不相适应的状况，把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董必武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负责拟定了《关于恢复关系的通知》，又据此通知重新审查了自监狱释出的和失掉关系的党员。1938年7月，田绥祥接任简师教导处主任。同月，田在武昌参加国民党举办的中央受训团期间，又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根据亲自审查田绥祥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掉关系的结论，确认了田绥祥的党籍。此后，田绥祥受董必武钱瑛直接领导，不与简师地下党发生联系，不参与其活动，成为以国民党员和简师教导处主任的合法身份，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掩护简师地下党活动的特别党员。董必武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设在沙市的鄂西中心县委和荆沙区委。董必武还通知田绥祥，湖北省委即将派傅君哲到简师。8月，傅君哲到简师担任数学教师。傅在向鄂西中心县委汇报时，提出了增派地下党员到简师的请求。同月，湖北省委和鄂西中心县委调张国栋、刘秉性到简师，张国栋的公开职业是国文、音乐教师，刘秉性的公开身份是事务员。同月，在湖北省荆州由张国栋、傅君哲、刘秉性组成了简师地下党支部，张国栋任支部书记。从此，简师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二）地下党组织的发展

1939年春，湘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派刚从延安抗大毕业回宜昌的史林峰到简师，始任简师党支部委员，公开身份为军事教官。同年8月，金巨堂强令辞退张国栋、傅君哲等五人后，史林峰接任党支部书记。

简师迁庆贺寺后，钱瑛将原在松枝宜战训班工作的松枝宜工委书记张师峨（又名张华俊，华东人，清华大学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业）、战训班党支部委员李寿慈（又名李镇，上海人，清华大学毕业）调入简师。张的公开身份是国文、英语、数学教师，李的公开身份是国文、数理化教师。为便于掩护湘鄂西区党委组织部长蔡书彬领导简师地下党的活动，钱瑛将蔡的妻子蔡林立（又名林居仙，燕京大学毕业、共产党员）调入简师，公开身份是英语教师。随后，钱瑛又将在宜昌战训班工作的李曼农（湖北省浠水县人、共产党员）、潘元凯（湖北省天门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共产党员）调入简师。李曼农任国文、历史教师，潘元凯为军事教官。

为了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和大量发展党员的指示，1938年秋至1939年夏，简师党支部先后在师范班学生中将优秀的“民先”队员蔡振万、李良珂、魏恒若、蔡国栋、孙振寰等17人吸收入党。由于党的力量加强，根据湘鄂西区党委指示，于1939年8月建立了党团联合支部，张师哉兼任书记，史林峰、李寿慈、蔡林立、李曼农、李逊夫（湖北省松滋县人，负责筹组党的抗日武装和与地方地下党联系）任支部委员。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下半年，简师地下党组织又在师范班、第三届师范科和附中部中发展夏奎（夏祖滋）、徐行、程仲梅、孙耘等30人入党。此外，1940年暑期，中共湘鄂边特委通过爱国民主人士刘隽的关系，以输送工人到简师学习为名，将松木坪难民配置区的地下党员余慧臣、王友荣、余兴夏（湘鄂边特委交通员）、万涛、康涛转入简师。

简师地下党组织在大量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其中有党的秘密工作教育、共产党员气节教育等。为搞好党的思想教育，编印了《党的组织系统》、《党的组织原

则》、《党的铁的纪律》、《党的三大任务》以及《支部工作纲要》等秘密文件。其中，《党的铁的纪律》中规定，执行决议，遵守纪律，保守秘密，被捕后决不自首；不违背群众利益、党的利益；不准随便发生横的关系；按时参加小组会，严格执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准打击、侮辱自己的同志，不准有派别小组存在、破坏党的精诚团结等。1939年冬至1940年春，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长何功伟、松枝宜中心县委书记魏泽桐，在指导简师地下党活动期间，经常给党员秘密地上党课。何功伟在党课中主要讲共产党员应该具备坚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英勇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斗争，保卫党的利益，严守党的秘密和纪律，不自首，不叛变等。简师党组织根据中央、南方局、湘鄂西区党委有关指示和何功伟、魏泽桐的党课精神，编印了党员对照检查提纲，主要内容有：执行党的组织原则情况、执行党的纪律情况、完成党的三大任务情况、发扬布尔什维克精神和作风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情况、帮助和教育发展对象情况、学习情况、发挥模范作用情况等。简师党组织经常的、严格的思想教育，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加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在恶劣的环境中开展各项抗日工作和坚持长期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抗大式的教学活动

简师迁松滋西斋灵鹫寺后，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培养大批人才，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中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改革了旧教育制度、旧课程，按照延安抗大的学习内容和方法实行了以抗战救国为目标的新制

度、新课程。

1938年秋至1939年冬，针对当时民族矛盾突出的特点，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加强了抗日的教育。因此，除开设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英语、音乐等专业课外，对公民课、国文课、历史课、体育课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改革。田经祥、张国栋、史林峰、张师载等人担任的公民课中增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战理论、政治工作、群众运动等内容，张国栋、李慎、张师载、李曼农等人担任的国文课中，摒弃了原来教材中的八股文，以讲授抗战文学为主，将文天祥的《满江红》、林觉民的《绝命书》、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日寇侵华十大罪行》以及《新华日报》刊载的抗日文章、小说、诗歌、散文等作为教材。在李曼农、史林峰等人担任的历史课中，主要讲授社会发展史、《日寇侵华史》，系统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自1894年第一次武装侵略中国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侵略罪行。史林峰、潘元凯、任菊清（河北省保定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共产党员）担任的体育课中，理论部分主要讲授操典、游击战术、夜行军知识、侦察学等。

在政治课教学中，通过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着重于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启蒙教育，为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和人生观奠基，认识真理和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大救国纲领》，着重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日的意义和基本政策，以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组织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的关系，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实质、升降、交错、

变化等等，从而坚定革命意志和立场；讲解《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则侧重于驳斥亡国论，批判速胜论，树立“持久战”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进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意义和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知识。

为满足广大学生追求真理、丰富知识、提高政治理论修养水平的需要，简师地下党组织设立了半公开的图书馆。其中报刊有《新华日报》、《新青年》、《七月》、《新观察》、《湘江评论》、《论坛》、《全民抗战》、《诗刊》等，书籍有《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决议和宣言》、《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与策略》、《社会科学基础教程》、《通俗经济学讲话》、《辩证唯物主义入门》、《大众哲学》、《社会主义概论》、《大众的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论政党》、《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中国的新西北》、《二万五千里长征》、《西行漫记》等。

在政治教育中，简师地下党还利用合法身份，组织政治演讲和政治讨论会，组织学术团体和宣传队，出版校刊、班刊等，进一步充实了政治课教育的内容，扩大了政治影响。

在军事课教育中，除掌握军事理论知识外，严格进行了队列操练，行军、投弹、射击、游击战术等实战演习。

简师的教员，大多数是参加过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清华、北大的学生，有的是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师范班（科）的学生，大都是有志于抗日救国事业的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虽然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广大师生对实行抗大式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自觉性较高，青年学生的政治、军事素质

提高较快。他们称简师是“革命的熔炉和摇篮”。

四、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第四区专员公署及所属各县政府机关、学校均撤至松滋县，荆州地区的大批难民亦流亡于此。松滋一时成为湘鄂边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简师地下党组织排除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干扰，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广泛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群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冬，经第四区专员公署批准，简师地下党支部以学生中的合法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民先）的名义，成立了“战时服务团”和“抗日宣传工作队”。

1938年冬至1940年春，简师抗日宣传工作队除在本校为周围的各界群众定期公演外，还专程到松滋县内的13个集镇，邻县公安，枝江、宜都，荆州、沙市，省府恩施，湖南省长沙市、常德市、澧县等地宣传演出。为了慰问前线的抗日将士、坚持敌后斗争的抗日军民，抗日宣传工作队还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到天门、沔阳、潜江、监利等沦陷区演出。演出的主要节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保卫黄河》、《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汪精卫》、《我们在太行山上》、《军民合作》、《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还有自编的鼓词、莲花落、相声、快板等。每次演出前，由擅长演说的师生发表演讲，田绥祥的演讲最能获得广大听众的共鸣，每当他讲到日寇侵华暴行时，台下一片哭声；每当他讲到抗日军民英勇杀敌

时，全场一片掌声。抗日宣传工作队每到一地，就深入群众，组织歌咏活动。《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人民喜爱的歌曲，男女老少都会唱。宣传队所到之处，抗日歌咏活动就蓬勃兴起。

通过美术作品，动员广大人民。1939年3月，简师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丰富多采的美术画展，展出的画有五百多幅，贴满了灵鹫寺的大厅、走廊。这次画展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罪行，生动地反映了军民团结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展出的七天中，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为扩大宣传效果，抗日宣传工作队每到一地，就展出一次，获得了数十万观众的赞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简师战时服务团，专门办有黑板报、阅览室、定期召开报告会，为抗战军人代写家信，劝募鞋袜、毛巾、款项、设茶水站等。其中有一万多人为慰问抗日将士捐送了钱物。同时，收到抗战前线战士数百封来信，均表示“要英勇杀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

简师地下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我们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事业，只有最广泛地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变成千百万人民的行动，这才是胜利的根本保证”的指示，为把简师的抗日救亡活动与广大工农民众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推动松滋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参与了松滋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1939年春节期间，田绥祥与松滋的爱国人士雷言午召集从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毕业回县的雷伯衡、邓万朗和刘明哲，从武汉回县的进步青年赵承修、李成浩等人开会决定，征募武器弹药，扩大

武装力量，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宣传范围，组织青年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农村保甲训练班，组织青年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以充后备兵源；成立抗日书报社，出售进步书刊等。会议还决定由田绥祥起草致松滋县长鄢说的“把松滋民众动员起来，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的建议书。在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推动下，鄢说接受了“建议书”，同意成立“松滋县青年抗战通讯社”和“松滋县青年抗战服务社”，并在朱家埠、复兴场、涴市、新江口、西斋、刘家场成立了抗战服务分社、抗战通讯分社，创办了“三日刊”，报道抗战动态、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战必胜、号召支援抗战等。抗战服务社组织了一个剧团，在全县巡迴演出历时两月。在街河市举办的每月一期的农村保甲训练班上，由简师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讲授政治课和组织游击战术训练。

简师地下党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松滋地区，乃至湘鄂边地区的抗日斗争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9年冬，湘鄂西区党委在松滋县邓家铺李逊夫家召开了中共湘鄂西区党委扩大会议。史林峰代表简师党组织参加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区党委书记钱瑛、区党委组织部长蔡书彬、区党委宣传部长何功伟对简师党组织领导和开展的抗日救亡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并对田绥祥进行了表扬。

抗战初期，简师地下党组织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了松滋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日寇占领松滋后松滋人民的反抗斗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打通大陆交通线，1943年5月至1944年5月，三次进犯松滋，受到了松滋民众的英勇反击。1943年5月13日至6月16日的“鄂西会战”中，日寇三个师团及汉奸邹平凡的伪军共

有步兵三万、骑兵二千侵入松滋；1943年11月3日至12月24日的“常德会战”中，日寇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及伪军邹平凡部进犯松滋；1944年5月28日至6月13日的“湘北会战”中，日寇以更大的规模进犯松滋。虽然日寇践踏松滋的暴行一次比一次残酷，松滋人民所付出的代价一次比一次惨重，但是，在抗击日寇的斗争中，涌现出了无数忠勇爱国、舍身殉国的英雄儿女；在牛长岭阻击、沙道观天主堂反击、皮家垱伏击、米积台夜袭等战斗中，军民合作，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谱写了一曲曲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壮歌。

五、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抗战初期，蒋介石被迫承认国共合作，他原想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结果事与愿违。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寇停止了军事战略进攻，加紧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因此，蒋介石不但由原来的抗战比较努力转变为消极抗战，加速投降活动，而且由原来的国共关系较好、政治上有一定进步，倒退为积极反共反人民，并把反共作为对日投降的准备。1939年元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通过了“整顿党务”决议案，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根据“整顿党务”决议案的原则，会后陆续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办法草案》等一系列防共、反共文件。紧接着，便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此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国民党第六战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